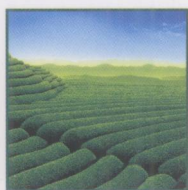


ZHONGGUO NONGCUN XIANDAIHUA SILU YU CHULU

中国农村现代化： 思路与出路



» 王立胜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中国农村现代化： 思路与出路

» 王立胜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胡元梓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刘越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现代化:思路与出路/王立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01-008304-9

I. 中… II. 王… III. 农村-现代化建设-研究-中国 IV. 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2909 号

中国农村现代化:思路与出路

ZHONGGUO NONGCUN XIANDAIHUA SILU YU CHULU

王立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5

字数:688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8304-9 定价:8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友人著书，嘱我写序，这是一份荣幸。

王立胜既是一位思忧天下的学者，又是一位努力造福一方的官员。正是这种双重角色给他带来体验理论与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便利，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又深刻的切入问题的视角，增添了一份一般书斋型学者通常缺乏的强烈现实感。众所周知，自严复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全部来源于西方。这些源自西方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不仅要求执行认识中国经验的使命，且要求成为评判中国现实、指示未来的价值标准。为了推动古老中国的加速现代化，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然而，由此形成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知识界的大问题：名实相怨。这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名不副实，更指学得西方理论的书斋型知识分子与实践者（尤其是政治、行政管理领域的实践者）之间的分裂。试看近代中国，有哪一位政治实践者不获骂名，而学术领袖们大抵获芳名于当今。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孙中山，原因是他并没有真正执过中国的政。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虽然频频发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呼吁，但用王立胜的话来说，“官员与学者的对立状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这种状况是极其有害的”。要改善“名实相怨”状况有两种途径：一是实践者从直接遭遇到的现实问题出发，上升到理论思考，这便是王立胜所走的路。二是学者进入社会生活场域进行调查与研究，这个“社会生活场域”应包括县市域官场。对中国而言，县域是社会学调研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单位”。现在的问题是，官员的防范与行政不透明给学者进入县域设置了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

王立胜积十年思考完成的此部论文集，集中讨论的是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谈到“现代化”，我们很快想到西方社会科学提供的二分法：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或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重点考察的是工业化及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若以工业化和

城市化为现代化的核心过程,那么我们考察农村时,主要将其视为农副产品廉价而有效地供给地与工业品的内销市场,因而谈的较多的是农业现代化而非农村现代化。因农业现代化而促成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求城市化加以吸纳。故而有不少学者要求废除户籍制并实行土地私有制以加快城市化进程,甚至要求放宽政策,允许农民工搭建类似印度那样的大面积贫民窟。王立胜考虑的是农村现代化而非单纯的农业现代化,他要求把中国农村现代化放置到“自19世纪以来,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实现超赶型的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加以历史性、整体性的透视,其中,“时空定位”与“社会基础”这两个概念值得读者重视。

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意,为什么新农村建设要十分重视“时空定位”与“社会基础”?因为在王立胜看来,这都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实践密切相关。新农村建设是否只是一个政府为主导的、以财政转移为依托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是否为亿万农民工进退建立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是否是为了最终消除城乡二元对立,实现城乡一体化?上述三大目标是否是同一发展目标的三个不同层次或近、中、远三大阶段?目标关系到时间:我们大概用多少时间实现上述目标?目标一旦确定,时间的长短决定推进的速度。目标高而大,时间快而速,往往会酿成历史悲剧,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至于“空间定位”,或许是作为县(市)委书记王立胜独特的视角:应以县域为单位,综合、全面地布局,实施新农村建设。不应定位在自然村,也不应定位在行政村或乡镇,而是以县域为单位统筹考虑。的确,就以公共设施建设而言,即令财政丰裕,也有一个使用效率问题。农村高分散的居住模式(这在丘陵、山区尤甚)与公共设施使用效率形成尖锐的矛盾。而要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分散居住习惯,实非短期奏效。再说,全国绝大多数市县财政都不富裕,单靠中央财政如何背得动数百万个自然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关于“社会基础”,拨开王立胜稍有点复杂抽象的定义,实指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重又“一盘散沙”的农村社会如何与“大市场”与“政府”对接的大问题,或者说如何重新组织起来的大问题。问题是明摆着的,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能是亿万农户,而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户才能形成新农村建设的真正的主体。看来,现有的村民自治组织和专业经济合作组织都无力承担此重任。按国际经验,综合着农民信用合作、供销合作、生产合作、技术合作的更大规模

高层次的农协组织才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主体。不同的农村发展目标,的确需要不同的农民组织形式。

纵观王立胜的论文稿,除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之外,便是他具有历史观和整体感,将中国亿万农民现代化的艰难进程放置到整个近现代历史过程中加以审视,这在学术日趋分化的时代,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快速市场化加剧的个体间竞争,促成我们的时空观念悄悄地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时间退缩为切己的当下,空间也充塞着利益的关切。忙碌于当下谋划利益的当代人们容易忽略民族整体的命运及其在历史中的运动。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个体化时代,执掌公共权力的官员与参与公共学术的学者需要以思想来守护我们的民族。

曹锦清

2009年7月10日

自序

这本书可以称为我的十年学术心路历程。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本书中收录了我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以各种形式发表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以及带有比较强的学术意味的演讲文稿,还有我在1999年前后为准备博士学业而作的系统性读书笔记。这些文字在格式体例上不尽统一,但集中反映了我在这十年间对一个问题——中国农村现代化所进行的多方面的思考,这种思考体现在理论研究中,也体现在我的行政工作中,并以一个最终成果,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呈现出来。

1998年对我而言,无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学术研究方面,都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从山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调到中共潍坊市委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开始了另一种角色,进入了另一个“生活世界”。十年间,我的工作又发生了两次变动,2001年调任山东省昌乐县县长,2005年年底调任青州市委书记。在我的内心,我一直同时以两种身份在观察和参与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大浪潮,也一直是两种心态“体验”着中国改革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两种身份和心态,一种是一名基层官员,一种是一名经受过系统学术训练、并且有长期学术实践的学者。这两种身份在进行着对话和交流,这两种心态也时时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对方,这给我带来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促使我对长期以来关注的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这种经历可以视为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度参与式观察”,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现只以一种身份和心态去观察和研究社会时难以发现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微妙关系。说这是一种微妙关系或许会让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在我的感受当中的确如此。许多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理论事实上却在实践的

检验中是那样的虚弱和苍白无力,实践是残酷的,这种残酷性不仅表现在它对身处其中的人的命运的巨大影响,也在于它对力图说明它、解释它、引导它、改造它的理论的无情的检验,这种检验往往让我产生巨大的怀疑。我们不能够怀疑实践本身,而只能将矛头指向于理论。在对现有的理论不满意的同时,对其进行修正甚至颠覆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学者与官员所遵循的是两种极不相同的价值评判系统,学者更倾向于求“真”而官员更倾向于求“善”,学者在试图追究事物的本源,要揭示这个世界的真相,当他完全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很少会去考虑这种“真”在生活世界中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官员求“善”,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求得到一种各个方面都能够接受的、能够实质性地增进某一区域、某些人群福利的实践结果,更通俗地说就是他必须要解决问题,甚至要使用一些不那么符合“理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布迪厄所说的实践的紧迫性也许就体现在这里。这两种价值评判系统使得官员和学者常常处于一种心理上的对立状态,互相以嘲弄的态度面对,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官员认为学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不管这个学者自认为多么深刻地了解了社会;学者认为官员是不学无术的胡作非为者,不管这名官员是否曾经有过名牌大学的经历,自认为对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这种状况是极其有害的,一方面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理论如何指导现实?在我看来,学术与实践,可以视为一条流水线上的上下游工序,理论创造应当成为下游的实践过程的“半成品”,应当成为政策基础。如果下游工序的操作人员总是认为上游提供的原料和零件完全不符合使用要求,那么这种衔接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理论就无法应用于实践,无法实现它的价值,因而学者的价值也就无法得到应有的体现。官员们很茫然,因为他缺乏有力的理论和思想武器以指导和改造现实,学者们也很无奈,于是会发出“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慨叹。必须要强调学者与官员的对话与交流,这种交流不能是表面化和形式上的,不能是仅仅强调学者要深入实践,官员要加强学习,而是必须要实现学者与官员之间在韦伯意义上的“移情”基础上的深刻理解,认清自己在中国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的自身位置,实现学术界与行政工作的良好互动。也就是说,必须要跨越文本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的遥远距离,形成紧密的结合,因此也就形成巨大的合力。这种想法也许过于现实主义,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语境当中,这种现实主义应当是有意义的。正

是在对理论与实践复杂关系的反复思考中,在学者与官员这两种身份和心态之间的游走中,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也进一步地领会了毛泽东所说的“实践”的深刻含义。“拈花微笑,意在其中”,也是人生难得的一种意境。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因,我认同从问题意识出发进行学术研究的观念和路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十分关注,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这些研究大都受到“学科意识”的支配,学者们局限于学科的视域和方法,因而得出的往往是局限于某一学科无法准确全面反映中国农村现代化规律的结论。经济学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关注农村发展,甚至把农村现代化过程还原为农业发展的效率问题,进而把农业的效率问题归结为农村农业的体制机制问题,从而认为,通过体制变革提高了效率也就找到了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道路。而在现实中,农民的行为事实上表现为农户的行为,从而很难用“理性人”假设加以概括和说明,当然这种理论也就更加无法有效解释农村诸种复杂问题的成因。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都从各个方面对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由于无法摆脱学科意识本身的褊狭而不能在彻底和综合的意义上取得进展。中国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的是“问题意识”的自觉,也就是说,当前需要各个学科以“问题意识”为基点,加强协作配合,综合使用各种理论方法,才能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实质性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严格的学术训练要求我时时以科学的态度,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对待自己的行政工作,以理性指导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的实践经验又使我能够更加成熟地看待各种社会现象,从实践出发进行深刻理论反思,以“问题意识”指导自己学术活动的展开。这本书中所收录的内容,也正是这种学者与官员、自己与自己对话交流的结果。

年轻时候看过的一首诗上说,“所有的梦想都源于一粒种子”,读者看到的这本书以及同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虽然源起于1998年,但是追根溯源,之所以后来走上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道路,那粒“种子”是从20年前,也就是1988年开始的。1988年,我进入山东大学哲学系跟随樊瑞平教授读研究生,将研究方向确定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硕士论文《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在修订后出版,以此获得1995年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段学习经历是我学术研究的开

端。当时并没有执意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做更多的关注和思考,但是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长期学习研究过程中,他对中国农村在革命与建设中的关键位置的论述和反复强调,他对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他主持制定的,被后来一些学者屡加抨击的具体经济社会政策都给我以极其强烈的心理震撼,这种震撼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实践的深度接触,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复一日地更加强烈起来。“农村问题”,从那时起就成为我在读书和研究时遥遥相望的一个目标。回首看来,那时的学习可以视为是为今后的中国农村研究做理论上的必要准备。可以想象,毛泽东著作中所体现出的高度责任感,无处不在的历史透视感,以及令人惊诧的透过表象直达本质的洞察力,他的综合性思维,对中国社会极其清晰透彻的分析会给一个刚刚踏上学术门槛的年轻人多么大的冲击和影响。这种影响对我而言至关重要。我的学术背景是哲学,在进入省委党校工作之后,接触了大量的来自山东各地的党政干部,他们带来了以前未曾接触过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这个老师来回答,当时的我是回答不了的。大量的阅读开始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书籍向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但是文本的表述远远不能够满足回答干部们从实践中带来的问题的需求,在我的争取下,我被派到山东省嘉祥县,一个当时比较落后的地方去挂职锻炼,我想以此机会来实现学术上的转型与跨越。挂职锻炼固然接触实践,但也只是锻炼而已,作为一个旁观者很难真正地触及实践的“隐秘核心”,无法对实践的逻辑进行全面的了解和体会,支离破碎的感觉也无法支持系统的理论表述,这又带给我新的不满足。1998年,我来到潍坊市委担任副秘书长,开始新的历程。在其后的工作中,围绕着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题,围绕着落实中央和上级政策,我系统研读了多学科的著作,“问题意识”也就逐渐成形。以前反复诵读的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方面的理论在实践的衬映下,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新的光彩。在10年时间里,我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些文字记录了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也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记录和描述。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理论思考、实践探索、读书笔记以及一个附录,附录收录了媒体访谈的一些内容。

“理论思考”部分收录的是从2005年开始,围绕着我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起就确定的研究主题——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而形成的

系列成果。这些论文都发表在 CSSCI 刊物上,其中“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重读毛泽东《组织起来》”(《现代哲学》,2006 年第 6 期)一文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 年第 3 期转载,同时被《新华文摘》2007 年第 8 期“论点摘编”转载;“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原型与核心命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 年第 7 期)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7 年第 7 期全文转载;“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 年第 2 期)一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 年第 4 期转载。这些文章以“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概念为分析工具,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村现实,系统阐述了实现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方法,为当前“三农”问题求解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途径,在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反响,被认为是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质的学术成果。这些文章集中论述了这样一个主题:19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实现赶超型的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诸种社会矛盾的总和。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由乡土性质、儒家伦理、宗族组织、乡绅力量和国家意志几方面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形成了特定的农民与农民个体之间、农民与农民组织之间、农民及农民组织与国家之间的稳定的连接关系与模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体制长期保持稳定状态的社会基础。近代以来,这种社会基础受到强烈的冲击与破坏,随着以西方模式为导向的现代化过程的展开,分散小农与国家之间、农民与市场或者资本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无法化解的紧张状态之中,不能够实现良性的对接,农民不能够在保证自身基本福利的前提下支持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努力都可以视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过程。而实践方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建构以及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走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可以将农民间的连接关系、农民个体与国家的连接关系以及由农民个体经由特定的形式组成的农民群体与国家的连接关系模式作为影响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模式和形态的重要因素,并以“社会基础”概念来概括这一组关系模式。相应的,也可以把调整 and 改变这种关系模式的努力称之为“社会基础再造”。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党的意志与农民福利之间的良性对接关

系,有效实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战略目标,实现了“翻转基层”的社会基础再造,建国后,又通过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合作社等进一步的行动,构建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和国家观念,农民作为有意识的、自觉的阶级的一分子成为新生的中国的公民,结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新中国的现代化有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使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农民与国家间的对接成本因此降到最低,党的意志和国家战略在这种社会基础条件下得到了顺利贯彻和推进,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快速工业化目标得以实现。1978年以后的改革,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取向,但由于渐进式的或者目标开放式的改革模式,相对于前两次而言,社会基础的重组和再造模式是比较模糊的。一方面,前一阶段的影响极大地延续下来,农民的连接关系并未实现转型,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没有多大改变;另一方面,总体目标实际上已经彻底改变了,进而导致市场化的目标与既定的社会基础之间都不兼容,小农与市场化目标无法实现对接。任何一种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相对接。而在我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现代化实践中,迄今为止的社会基础并不能与实际上的发展目标相契合,由此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要实现与社会基础的契合;另一方面,要再造社会基础以实现与总体目标之间的对接关系。这些文章指出,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再造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和中心环节,论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与之相对应和对接,农民之间、农民与国家之间、农民与市场之间应当形成怎样的关系模式和联接方式,在农村地区应当设立怎样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怎样有效促进和调控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再造过程。通过这些文章,尝试回答了在市场化、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使农民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在保证自身福利的前提下,实现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对接,为中国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由于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方面的成绩,以及在博士学位论文准备方面的表现,我获得了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全校文科仅有三人获此资助,并且被学校确定为以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重点扶持人选。这些文章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基本框架,2008年6月初已经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评审委员会给出的评判是:“这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博士论文”,对于我这个40多岁的“老学生”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奖

励了。

“实践探索”部分收录的是我在2001年到2008年,也就是在昌乐县担任县长和在青州市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根据我所担负的职责,着眼于推进实际工作,根据当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所撰写的一系列兼具学术性和政策性的文章,也有少数几篇是一些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贸易报》对我所倡导和推行的理念与政策做的专访和报道。这些文章从纯学术角度来看理论性和规范性不够强,但所反映的是一名兼具理论追求和实践诉求的实践者,在作为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微观基础的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探求和思考。这些思考集中在如何破解城乡统筹难题,如何在农村基层实现现代化,并且在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担任山东省昌乐县人民政府县长5年间,我推行了一系列着眼于从根本上优化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提升昌乐县核心竞争力、培植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深厚底蕴的积极举措,使昌乐县由潍坊市相对落后的地区成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后劲足、机制顺、环境好的地区。从主要经济指标上看,2005年与2000年相比,昌乐县GDP增长为212.9%,财政总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29%和97.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增长324.6%;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综合评价中,昌乐县由2001年的372位前移至2005年的252位,5年间位次前移120位,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2005年调任中共山东青州市委书记以来,重视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展工作。我特别强调了综合性思维的重要意义,强调要以思维方式的改变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青州是一个古城,历史上一度非常发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被称为“长江以北第一县”,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速度和效益明显不如国内省内的一些地区,为了实现“青州复兴”这个青州人民的共同心愿,我在2006年初首先从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开始打开工作的突破口。提出了破除小农意识、破除小市民观念、破除计划经济意识的口号,并以体制机制的创新保证能够落到实处。所有的重要会议都以电视现场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公开,下大力气解决干部作风散漫的问题,从解决政府诚信问题出发,一方面彻底解决那些政府应当解决的问题,完成政府应当完成的使命和任务,另一方面,毫不手软地打击破坏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势力,树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形象。调动各个方面

的积极性,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群众为主体的凝心聚力的发展局面。在我看来,青州的发展要解决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将人心凝聚起来,以一个被各方面所认可的目标使力量导向于一个方向,实现高水平的社会动员,在此基础上建立严格的制度措施和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在一个有秩序的框架内平稳进行。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改造的过程,通过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政策行动,调整青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调整青州社会结构模式,不是简单地修一些路、建一些学校、工厂、公园、博物馆,不是简单地发展起几个优势产业,而是要从根本上建立起一种有利于青州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形态,使之有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对于青州而言,这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而具有社会变迁的含义。以这种观念为指导,围绕工业振兴、服务业提升、城市建设与管理转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个工作重点,实施新的城市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初步形成了南部文化产业园、北部经济开发区两翼齐飞,东部黄楼花卉园区、西部猛山经济发展区首尾互动,鲲鹏展翅、昂首东进的城市发展格局,为青州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机制体制创新推动工作开展,青州实行了书记、市长抓“总”,常委包“片”,副市长管“线”,人大、政协领导靠“点”的工作机制;立足改革、发展、稳定、党建四大方面成立21个领导小组,成立50多个重点工程指挥部,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避免了部门条块分割、各行其是的缺陷,强力推进各项工作进度,做到了领导合力最大化。成立“市人民办事中心”,70多家单位进驻,纳入各类审批、收费、服务项目506项,集行政服务中心、会计集中核算中心、招投标中心于一体,基本实现“进一个门办一切事”;统筹城乡财政,平衡区域财力,基层机关干部、教师和村主要干部工资由市财政统一发放,离退休人员工资实现社会化发放;成立会计集中核算中心和国库集中收付中心,进行集中核算和收付,努力做到财政收付阳光化。政府行政效率空前提高,干部作风得到明显转变,青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得到极大优化。注重社会公平与和谐,全力做好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大力发展敬老事业,把2007年作为“青州市敬老院建设年”,年内投入1500万元,提高五保供养标准;突出抓好农村养老院建设,建设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的青州市中心敬老院,集中供养周围7个镇(街道)的五保对象;其他镇各建一处镇中心敬老院,确保“五保”集中供养率达到95%以上;高度重视卫生工作,

确保年内标准化卫生院建成率达到 100%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 99% 以上, 农民大病报销上限由 1 万元提高到 2 万元, 2008 年达到 2.5 万元;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将低收费甚至免费的职业教育作为提高劳动力素质, 同时有效降低青少年违法犯罪率的积极手段; 从群众最关心的地方入手, 持续进行打黑除恶行动, 群众安全感大大提高; 我在电视直播大会上承诺亲自拆批每一封人民来信, 仅 2008 年就批阅各种人民来信 2110 封, 同时建立起了完备的领导接访制度, 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经济发展方面, 做强做大机械加工、石油化工、冶炼建材三大工业主导产业, 突出抓好现代物流、旅游休闲、花卉苗木三大优势产业, 立足青州比较优势,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青州形成了勇于拼搏、敢于竞争、乐于奉献的新时期“青州精神”, 在这种精神感召下, 青州市与北京市竞争, 获得了 2009 年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的主办权, 国家地质公园、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申报创建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从主要经济指标上来看, 青州市地区生产总值, 2005 年 140 亿元, 2006 年 177.6 亿元, 增长 26.9%, 2007 年 221.1 亿元, 增长 24.5%, 2008 年 263.5 亿元, 增长 19.2%, 相比 2005 年基本实现翻番; 财政总收入, 2005 年 19.8 亿元, 2006 年 23.8 亿元, 增长 20.4%, 2007 年 26.7 亿元, 增长 12.1%, 2008 年 31.5 亿元, 增长 18%; 地方财政收入, 2005 年 5.15 亿元, 2006 年 6.46 亿元, 增长 25.4%, 2007 年 9.72 亿元, 增长 50.5%, 2008 年 11.8 亿元, 增长 21.2%; 各项存款余额, 2005 年 121.6 亿元, 2006 年 138.2 亿元, 增长 13.7%, 2007 年 161.2 亿元, 增长 16.6%, 2008 年 204 亿元, 增长 25.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05 年 53.15 亿元, 2006 年 61.7 亿元, 增长 16.1%, 2007 年 72.8 亿元, 增长 18%, 2008 年 89.4 亿元, 增长 22.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5 年 9113 元, 2006 年 9752 元, 增长 7%, 2007 年 11005 元, 增长 12.8%, 2008 年 12818 元, 增长 16.5%; 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5 年 4630 元, 2006 年 5183 元, 增长 11.9%, 2007 年 6105 元, 增长 17.8%, 2008 年 7023 元, 增长 15.0%。青州社会稳定和谐、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城市面貌大为改观、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政通人和, 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这些成绩的取得, 与长期在农村现代化研究方面的努力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收录在本书“实践探索”部分的这些文字, 正是理论研究应用与实践工作的一个写照。这些文字牵涉的方面比较广, 可以说涵盖了县域治理

的方方面面,有些是直接谈工作思路和政策安排,谈经验与体会,有些则力图从繁杂的行政实践中抽象出制约或者促进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力量,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和力量的存在,以及它们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各个区域的发展才呈现出极为不同的面貌。对于这一方面,我从“文化自觉”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索。提出了文化自觉是实施经济文化强县战略的文化心理基础、文化自觉是推进经济文化强县战略的文化心理动力、文化自觉是实现经济文化强县战略的文化心理保障的观点,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在2008年7月7日刊发我的文章“发挥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青州实现经济文化强县战略的做法得到各方面广泛认同。科学发展观如何在基层得以真正落实,和谐社会的理念如何在基层得以真正实现,一个区域如何实现错位发展,这些对县域治理来说至关重要,对整个国家而言也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对此我进行了不懈的思考。“三名一强生态文明新青州”的提出,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都是在努力将中央的政策和精神在县域发展的实践中做出因地制宜的、彻底的落实。“创意城市”观念的提出和在全面工作中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青州各方面的发展,《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在2008年5月20日专门刊发了“山东青州探索‘创意城市’的文化建设新路”的文章介绍这一经验。这些文字凝结着昌乐和青州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与心血,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两个地方的发展进程,更进一步地说,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实践在县域范围内的巨大进展。我为自己亲身参与并且为推进这一进程做出贡献而深深地自豪。

“读书笔记”部分收录的是我在1999年前后进行的系统专题研读的阶段性成果,积累了20多万字,多数没有发表过。这些文字是我在进入一种新的工作状态,在摆脱纯粹的“读书人”角色,以新的视角切入基层实践时进行的系统思考。一共分为九个部分,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渊源到路径依赖,从中国农村的经济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从农民的非农化到小城镇建设再到中国农民的现代化,事实上我此后的研究思路是在这个时候基本形成的。这些文字本来可以形成一本专著的,但是由于有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这篇博士论文,更加全面地阐述了我的思想观点,这些文字也就不打算再单独出版,就将其收入这本书中。

“媒体访谈”部分收录的是近几年来各种新闻媒体对我的访谈和报道的

文字内容。这些文字从另外的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对县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思考和实践,同时又有媒体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一并收入本书中。

这几个部分事实上都是围绕这本书的名字“中国农村现代化:思路与出路”来展开的。并且由于这些文字形成的时间不同,一方面反映出我个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反映出我学术心路的轨迹,反映出我学术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些文字反映着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反映着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也反映着中国学术界在农村研究方面的积累与进步。在回顾这些文字时,我庆幸能够有这样一种横跨学术界与实践领域的机会,能够让我有这样的角色和心态多层面、多角度切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研究与实践,也为自己能够始终跟得上学术研究的潮流,能够自觉使用最新的理论、方法就前沿问题进行研究,并且成果能够为学术界所认可和关注感到欣慰。如果说,十年前开始系统作关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读书笔记是一个起点的话,那么2008年以中国农村现代化为主题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可以视为一个阶段性的句点。一个真诚的理论研究者,一个勤奋的基层实践者对祖国的爱,对学术事业的追求,对自身职责的承担,以十年回顾的方式,以这些文字,呈现在您的面前。